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

1925年，不满24岁的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了一种“疯狂”的理论：抛弃那些无法观测的电子轨道概念，只用光谱数据来构建新力学。他自己也搞不清这些符号的数学本质，便将手稿寄给了导师玻恩。玻恩没有否定这个年轻人的“异想天开”，反而敏锐意识到其背后的数学结构是矩阵代数，并与助手约尔当一同投入研究。三人合作数月，建立了矩阵力学的数学框架。海森堡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玻恩对“离经叛道”的包容欣赏、跨学科团队的合力攻关，构成了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生动注脚。

今天，科技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制度的竞争，更是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竞争。科学精神是求真务实、理性批判、勇攀高峰的内在驱动力，是科学事业的“灵魂”；创新文化是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开放合作的社会氛围与制度条件，是滋养创新的“土壤”，两者共同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深层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引领推动我国科技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坚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使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今年4月，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些重要论述，为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指明了方向。

然而，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原始创新根基依然偏弱，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顶尖科研人才尚有不小缺口。如何实现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的提升？如何把未来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光靠硬件设施的持续投入显然不够，更需要在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深层涵养上下功夫。审视现实，一些阻碍科技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

从教育源头看，开创性精神的系统培养仍需加强。现行教育体系在知识传授方面成效显著，但在培

育学生的科学思维、探索精神和开创性能力方面有较大提升空间。基础教育阶段，应试导向偏强，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对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激发还不够充分。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而当一个学生习惯了在既定框架中寻找唯一解，他便逐渐丧失了提出问题的冲动。高等教育阶段，专业划分过细、学科壁垒森严，不利于跨学科思维与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虽然基础知识扎实但存在开创性精神不足的问题。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土壤肥力”，即崇尚探究、敢于质疑的科学素养，有待通过更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来提高。

从科研生态看，功利化倾向与评价导向需进一步扭转。经过持续改革，“四唯”的倾向得到明显纠治，但惯性尚未根除。科研工作者将大量精力投入项目申报、中期考核与各类人才“帽子”的竞争性答辩，科研时间被切割为零散周期，科研活动在一些领域被异化为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和项目经费的短期竞赛，导致部分研究追逐热点、回避难题、急于求成。而对真正需要以长期主义态度对待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稳定性支持与制度性保障仍显不足。评价导向一旦偏离科学规律，就会催生急功近利之风，侵蚀甘坐“冷板凳”的定力，最终削弱原始创新的内在动力。

从人才环境看，对探索性失败的包容机制尚不健全。创新，特别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本质上是向未知进发的高风险探索，失败是常态，成功是偶然。爱迪生在找到具有实用价值的耐用灯丝前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却说他没有失败，他只是找到了一万种行不通的方法。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乃是源于一次“失败”的培养皿实验。然而，目前的科研项目管理、经费使用 and 绩效考核体系，总体更倾向于支持确定性较高、成功率较大的研究。对那些目标高远、路径不明但可能孕育颠覆性突破的探索性项目，尚缺乏有效的包容机制。科研人员担心失败影响职称评定、项目续期和学术声誉，因而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挑战科技“无人区”、开展原创性研究的勇气。

更深层次地加以审视，创新文化的涵养还需要在汲取传统智慧与拓展全球视野两个方向上发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

的创新哲学与智慧，如“格物致知”的探究精神、“革故鼎新”的变革意识、“天工开物”的工匠智慧等。如何让这些古老智慧与当代科学精神和创新实践相融合，塑造出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中国创新文化标识，仍有待深入破解。同时，重大科技突破往往源于全球范围内的思想碰撞与智慧交融，我国科技对外开放合作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常态长效机制有待完善，创新文化需要在开放交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实践反复昭示：教育培养、评价导向、制度环境、文化浸润环环相扣、彼此嵌套，任何单一改革都难以撼动深层积弊。唯有摒弃零敲碎打的路径依赖，以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方能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

教育是创新人才生长的根脉，根深方能叶茂。应推动教育范式从“以知识传授为中心”转向“以思维塑造和能力培养为中心”，把好奇心、批判性思维、求真态度和探索勇气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基础教育阶段应显著增加探究性、实践性课程比例，关键性考试中宜提高启发性、开放性、综合性试题权重，倒逼教学从“老师讲、学生记”转向“师生共探、问题驱动”。高等教育阶段可打破院系壁垒，大力推进跨学科课程、项目式学习和本科生科研计划，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锻炼知识联结与开创新能力。教师是科学精神的直接传播者，应加强对各级教师探究式教学、批判性思维引导能力的培养，使课堂真正成为思辨与创新的“苗圃”。

评价体系是科研活动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科研人员的天才和精力就流向哪里。改革评价体系，应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让最了解岗位需求、实际贡献与团队协作的用人单位自主制定评价标准；发挥小同行专业评价作用，由真正熟悉该领域前沿与难点的同行进行评议，避免“外行评内行”。对从事基础前沿研究的人员，更加注重原创思想、科学价值和长期积累；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人才，重点考察成果的应用价值、转化潜力以及对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支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减少过频的年度考核干扰，把评价重点从论文数量转向成果的创新性、对关键问题的实际贡献和人才培养成效，让评价回归科研本真，引导科研人员把精力集中到

需要长期攻关的重大问题上。

创新的生命力，在于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如果制度不容许试错，科研人员就会倾向于选择低风险、跟跑性质的方向，“从0到1”的原始创新便无从谈起。为此，应健全“尽职合规”的包容机制，对技术路线合理、过程规范、经费使用合规但未达成预设目标的探索性研究，经专业评估后正常结题，不简单记入负面信用，探索中形成的非预期数据与经验教训作为公共知识留存。对前瞻性、非共识、探索性研究，考核不宜过密，技术路线允许确认知深化而调整。此外，还应为非共识项目留出制度空间，评价与资助重在看科学问题是否立得住、研究过程是否规范，而不以是否立刻形成主流共识来取舍。爱因斯坦提出光子假说时，连量子论的重要奠基人普朗克都认为它“走得太远”。如果以当时的主流观点为取舍标准，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进程恐怕会大不相同。

科学精神的生长，不仅需要制度松绑，更需要文化滋养。应系统梳理中华文明典籍与科技遗产中蕴含的创新思想和方法论案例，用现代语言和全球视野加以阐释，使之进入通识教育和公共传播。将老一辈科学家的奉献和探索精神，尤其是“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等，有机融入科研伦理、工程教育和通识课程，引导科技工作者把个人探索与国家需求统一起来。同时，以文明互鉴涵养创新文化，鼓励科学家围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支持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参与高水平国际科技人文对话，展现我国在解决人类共同挑战中的科技贡献，彰显“兼济天下”、“和合共生”的理念，让中国创新文化在交流互鉴中更加丰富、更具活力。

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创新文化，是一项关乎民族长远发展的系统工程。它有赖于教育、科技、人才、文化各领域的协同改革，有赖于政府、社会、市场、个人的共同参与，更有赖于久久为功的历史耐心。可以相信，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求真务实、理性批判、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将更加深入人心，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开放合作的创新文化将更好浸润社会。当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时，我国科技创新的根基必将更加坚实，动能必将更加澎湃。

（据《求是》）

短视频是国际中文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其碎片化叙事重塑了海外受众的中文认知模式。本文结合媒介认知与跨文化传播理论，梳理中文短视频的叙事特点，拆解海外受众的递进式认知路径，分析认知偏差与现实问题，并提出适配受众认知规律的传播优化策略，以改善浅层化传播现状，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为国际中文传播的新媒体实践提供参考。

引言

新媒体时代，国际中文传播也慢慢向着短视频、社交化的方式发展。短视频凭借低门槛、场景化、高互动的特点，冲破了时间和文化的障碍，成了海外受众接触中文、认识中国文化的主要途径。受众的认知也不再依靠系统的教学，而是在碎片化的媒介体验里形成。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传播策略，很少从受众的认知形成逻辑入手进行探究，不能满足跨文化传播的需求。所以对短视频叙事下国际中文受众认知路径和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弥补不足之处，推进国际中文传播的高质量发展。

一、跨文化中文短视频的叙事特征

（一）叙事主体平民化，消解传播距离感

传统的国际中文传播是以专业机构为依托的，传播的语态是严肃正式的，很容易使海外的受众产生一种距离感。短视频彻底打破了专业传播的垄断，把普通人、海外留学生、中外青年等当作传播主体，用生活化的、平等化的角度来讲述中文和中国故事。这种平民化的叙事抛弃了生硬的输出姿态，把文化传播纳入日常娱乐的环境中，消解了传播的功利性，很好地降低了海外受众的心理抵触。

（二）叙事内容场景化，贴合认知规律

中文短视频抛弃了枯燥的理论化教学内容，把中文词汇、语言逻辑和文化内涵融合到生活场景里，以日常交际、民俗文化、城市生活等具体的主题为依托进行叙事，达到语言符号和真实场景的有机融合。短视频把抽象的语言知识用可视化画面表现出来，符合大众的具象认知思维特点，也满足了受众碎片化休闲接收的习惯，使受众能够在轻松的媒介浏览中逐步积累起基本的中文和文化认知，形成灵活多样的跨文化认知场景。

二、国际中文受众的递进式认知路径

（一）感官接触的被动认知阶段

感官接触属于受众认知的起步环节，基本表现出一种被动的随机状态。海外受众多是出于休闲浏览短视频的无意中接触到中文内容，并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只是用视听感受来体会中文的语言、汉字的形式以及中国式的画面。该阶段的受众不能理解语言和文化背后的意义，没有建立起符号和意义之间的联系，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认知上，但是这种无意识的感官接触是受众中文认知启蒙的基础，给后来的深入认识打下基础。

（二）场景绑定的浅层感知阶段

受众从单纯地感受短视频到步入浅层认知，把中文词汇、简单句式同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文化现象联系起来，并且能记住一些基本的日常用语，理解一些基础民俗文化符号的表面意义。该阶段的受众已经从单纯的感官模糊认知中摆脱出来，有了基本的语言和文化认知，但是这些认知是分散孤立的，没有被系统整理出来，受众不能提炼出一般性的语言逻辑和文化规律，他们的总体认知具有明显的碎片化倾向，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认知体系。

（三）价值认同的深度建构阶段

深度建构就是受众认识升华的过程。由于接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受众就渐渐开始对碎片化的消息加以整合，进而把中文表达的思路理出头绪，从而体会到中式思维和文化内核。经由中外文化以及生活场景的比较，受众能领会到中文的语言特点及其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中心含义，并且可以自行建构起完备的认知架构。部分受众会主动去学习、互动、传播，从而把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

结束语

短视频平民化、场景化叙事特征给海外受众打造了一条新的认识中文、认识中华文化的路径，其传播渗透力远远超过传统的传播方式。但是碎片化传播也造成认知零散、刻板印象和文化折扣的问题，妨碍了深度文化认同的形成。所以要依靠受众的认知规律来改善短视频的叙事方式，创建分层的内容架构，革新叙述的角度，从而达成碎片化和系统化并行的传播策略。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大学）

跨文化短视频叙事下国际中文受众的认知路径探析

张改

“党建+”模式赋能高校就业育人提质增效——探索新时代高校就业育人体系建设新路径

陈佳琳

新时代背景下，就业育人是高校落实“三全育人”的重要一环，既要提升学生求职竞争力，更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择业观，为国家输送合格建设者。当前，不少高校在党建融入就业育人方面进行实践，但仍然存在融合不深、协同不畅、党建和就业工作“两张皮”等问题。如何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就业育人实效，成为高校人才培养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本文就此方面进行探索。

当前，高校“党建+就业育人”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一是党建与就业育人融合浮于表面。部分高校党建侧重理论学习 and 组织建设，就业工作聚焦求职能力、就业率统计，两项工作缺乏有效衔接，思想引领难以嵌入职业规划、实习求职全过程。二是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格局尚未形成。就业育人涉及学校、院系、企业、政府多方，但校内党建与就业部门联动不足、校企党建共建深度不够，难以形成育人合力。三是就业育人存在“重技能、轻价值”倾向。部分就业指导侧重简历、面试等实操教学，忽视职业理想与家国情怀培育，少数学生择业功利化，个人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脱节。

破解上述难题，要以立德树人為根本，以党建引领为抓手，统筹价值引领、能力培养、资源整合、机制协同。充分发挥党组织优势，把思想引领贯穿学生大学成长全周期；大一做好职业价值启蒙，大二、大三强化职业素养，大四聚焦就业兜底帮扶。搭建校—院—支部联动、对接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协同育人架构。

推动“党建+就业育人”落地见效，要从课程、实践、师资、服务、机制五个

方面发力。推进课程融合，打造价值引领与就业指导相结合的课堂。将党的创新理论、国家战略需求融入职业规划课程，开设职业价值观专题讲座。推动党员专业教师用好课程思政，将就业育人融入专业课教学，实现专业教学、求职指导、思想引领协同推进，引导学生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做实服务融合，开展精准化就业帮扶。发挥学生党支部贴近学生的优势，常态化摸排就业诉求，建立困难学生台账，落实“一生一策”。开展党员结对帮扶，组织党员教师、学生党员对重点群体开展一对一指导，兼顾求职辅导和心理疏导；借助新媒体精准推送岗位与政策信息，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抓好机制融合，夯实长效保障。把就业育人成效纳入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压实工作责任。统筹党建与就业专项经费，保障课程开发、基地建设、实践活动开展。建立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评价体系，既看就业率、基层就业比例，也关注学生思想状态、用人单位满意度。完善激励机制，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营造良好育人氛围。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落脚点。以“党建+”模式赋能就业育人，把思想引领落到学生求职成长的现实需求上，实现党建工作与人才培养双向互促，引导广大毕业生把青春奋斗融入祖国建设，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本文系长江大学党建研究课题“党建+”模式下高校就业育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25C10）成果】

红色资源数字化赋能青少年“筑基”工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李松奥 张胜文

红色资源镌刻着党的革命征程与英雄事迹，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宝贵财富。青少年“筑基”工程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指向。推动红色资源数字化赋能“筑基”工程走深走实，既是赓续红色血脉的时代必然，也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脑海的创新路径。数字化赋能绝非“技术+内容”的简单叠加，其深层命题在于推动青少年从历史认知到价值认同的深层转化。

夯实理论根基，把握符号逻辑。从文化记忆理论审视，红色资源并非一般历史遗存，而是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记忆之场”，其深层价值不在物质载体本身，而在于所编码的“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数字化的本质，是对这一集体记忆进行符号提取、编码转换与再传播，使分散的、地域化的红色记忆转化为可共享、可再生产的数字符号系统，让各族青少年在超越地理局限的“记忆共同体”中完成认同建构。由此衍生出三重逻辑：技术赋能与文化传承，重点在于让技术服务于红色记忆的延续和再表达；个体参与和集体建构，关键在于促使青少年从历史的旁观者转为记忆的参与者；多元叙事和共同价值，则要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红色记忆汇入统一叙事，在多样表达中凝聚共同价值，实现“多元一体”。

突破场域局限，建构记忆空

间。传统红色教育受时间、地域制约，偏远乡村、边疆牧区、民族地区青少年难以常态化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借助3D建模、全景漫游等技术，南湖红船、井冈山、西柏坡等红色地标被复刻至云端，青少年通过终端设备便可“走进”中共一大会址、“步入”遵义会议场馆。场域再造的理论意义不止于教育公平。传统红色教育的认同建构依赖“身体在场”，数字化场域则创造了“虚拟在场”新形态。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指出，记忆依赖于社会框架，个体记忆只有在集体框架中才能被唤起。数字化场域为各族青少年提供了超越地域局限的“共同记忆框架”，使他们在共同历史叙事中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主心骨，红色江山是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这种跨越地域的共同学习体验，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升维叙事方式，促进价值内化。传统红色教育多以单向说教、静态展示为主，难以适配当代青少年认知习惯。VR、AR等沉浸式技术让青少年身临其境体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岁月；“数字重走长征路”等互动平台将健身打卡、路线闯关、党史问答有机结合。更为关键的是，数字叙事能够深度挖掘体现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红色记忆——长征途中“彝海结盟”、抗日战争中各族儿女同仇敌忾、“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人间大爱、库尔

班·吐鲁木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的经典佳话，这些故事虽地域不同、时期各异，却共同诉说着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共同体。叙事升维的核心机制在于“情感转化—认知深化—价值内化”的三阶转化：沉浸式技术触发情感共鸣，交互式叙事引导理性认知，情感与认知反复交融最终完成价值内化。其关键在于叙事能否触及“共通的情感结构”，将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深层情感从历史深处激活，使之成为当代青少年可感可触的精神资源。

精准分层滴灌，推动认同进阶。青少年群体学段跨度大、认知差异明显。针对小学生，依托红色动画、数字绘本等轻量化载体，播下爱国的种子；针对中学生，推出红色剧本推演、历史沙盘模拟等沉浸式内容，引导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逻辑；针对大学生，搭建红色数字资源库、虚拟教研室，引导青年学子将红色基因转化为报国行动。数字化分层育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使共同体意识培育遵循从感性认同到理性认同再到行为认同的递进规律。小学阶段启蒙教育播下“五个认同”的种子，中学阶段探究思辨建立历史认知框架，大学阶段理论深耕完成价值信仰确立，让共同体意识在不同成长阶段循序渐进地落地生根。

防范数字化异化，协同多方共育。红色资源数字化赋能“筑基”工程，必须杜绝重建设轻运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审